

赖大仁 主编 郭宝亮 著

洞透人生

刘震云

与

的小说世界

历史的迷雾

九
十
年
代
文
学
批
判
丛
书

.425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郭宝亮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九十年代文学批判/赖大仁主编)
ISBN 7-5080-2060-X

I. 洞… II. 郭… III. 当代文学-小说-文学评论-
中国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28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6.5 印张 101 千字 插页2

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什么是文学？怎样来研究文学？这是古往今来人们常谈常新的话题，就是现在，大家也仍在饶有兴味地谈论着，甚至是争论着，但看来未必能得出一个最后的大大家都认同的结论。

过去人们曾经提出了种种看法，比如，有人说文学是对自然的摹仿，于是，便从文学与摹仿对象的关系来研究文学；有人说文学是作家心灵情感的流露或表现，于是便从文学与作家的个性、心理的关系来研究文学，有了考证批评或传记批评、心理批评等等；又有人说文学既非摹仿也非表现，而只是一种语言形式或符号结构，于是便从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面来研究

文学，出现了形式主义的种种批评流派；还有人说文学是某种神话原型的隐喻式表现，于是倡导从神话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此外，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女权主义等各种角度来研究文学的也有不少，当今仍不断有人提出新的看法或研究思路，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记得童庆炳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各种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不过是同一房子的不同窗户，打开任何一个窗户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并且富有启发性的。

就笔者而言，虽然也一直想弄明白有关文学的一些道理，但自知超不出前人的智慧，提不出什么新说。不过，将别人关于文学的一些看法仔细想想，有时略有所悟，觉得有可以稍作引申之处。

比如，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流行的一个文学观念，就是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要求联系社会生活的状况来研究文学。这应当说也是不错的，不见得比别种说法更无道理；而且，比较而言，这种看法的涵盖面要宽广得多。近来理论界倡导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认为其最大的特点、优越性是视野开阔。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过要从视野和涵盖面来说，“文化”的范畴未必会比“社会生活”的范畴更宽。现在人们不大愿意再谈这样一个老话题，我想不是它在根本上错了，而是由于过去往往

只限于从阶级的、政治的、正统或官方意识形态的意义来理解和看待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就是仅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层面来研究其与文学的关系，而其它一些方面或层面的关系则被遮蔽了，造成一定程度的庸俗化、简单化、肤浅片面乃至僵化的弊端，引起了人们的逆反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化地对待这个问题，而是致力于去揭开那些曾被遮蔽了的方面或层面，去开掘这个理论命题中我们过去未曾充分注意到的丰富内涵，那又将如何呢？比如说，我们换个角度，从民间的或者说市民社会的角度，从民众生活及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民间、民众生活）的关系，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呢？

不由得联想起巴尔扎克关于“风俗史”的说法。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声言：“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耀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那么，不妨设问一下，巴尔扎克的理解中历史家们没有忘记写的那部历史指的是什么呢？无疑是指官方的历史，惑者说是按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编写的历史，是由帝王将相、英雄人物、

重大社会事件、朝代更替演进或政权嬗变等所构成的历史。写这部历史是历史家的职责和任务。当然有时候文学家也会介乎其中，来一番“演义”或者“戏说”之类，但人们毕竟不会把它们太当真。除此之外，历史还有另一种形态，这就是民间的民众的实际生活构成的历史，这部历史如汪洋大海无边无际，历史家无法去把握它，也不可能去写它，而这恰恰是文学家的广阔天地，文学在书写这种形态的历史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老巴尔扎克说他要写出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即风俗史，我想是有深意在焉。

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便有“正史”、“稗史”之分。“正史”是官方的，准确地说是官修的历史。我国很早便设立史官记写史实，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一官修历史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这部历史的内容不言而喻，民间生活是不在其视野之内的。不过，统治者对于民间生活也不是全然不顾，为了“观风俗、正得失”，有时也需要了解民风民情，于是便派出一些人去考察民间生活情况，收集老百姓中的各种“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记写坊间各种奇异之事，提供给当政者参阅。这些民间探访者就被称为“稗官”，而他们记写的民间奇闻轶事则被称为“稗史”。我想这和所谓“风俗史”也该相差不远吧。

当然，我们这里并无意于分辨历史，我们所感兴趣

的是与此有关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小说主要是从“稗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与巴尔扎克关于小说是风俗史的说法岂不是遥相呼应？并且，关于中国小说与风俗史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了。我们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诗文始终是文学主流，也始终是被纳入正统意识形态之中起作用的，二者互为因果。而小说因其出于“稗史”，出于民间，为统治者所鄙视，因而不为正统意识形态所看重，只能处于“边缘化”地位，如荒郊野草般自生自灭。不过，恰恰是由于这种“边缘化”，使其与民间生活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这正是它的蓬勃生命力之所在。当然，和后来统治者看清了小说影响民众的巨大潜力，又极力要将其纳入到正统意识形态中来加以规范利用，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不管怎么说，倘若小说真的从民间生活中连根拔起被供奉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神坛上，那它就不可能有多少生命力。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它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生机活力，那么就可以在民间生活中找到其生命源泉（这个道理应当说适用于所有文学形态，只不过对小说似乎显得更为突出罢了）。

沿着上述思路，我们不难获得某种启示：从民众生活、民间文化形态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文学现象，确乎可以开拓一片新的视野。近一时期来，从文化的视角来

考察和研究文学也确乎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与以往偏重于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正统意识形态的视角研究文学形成某种对应，这不光是一个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的思路、方法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文学研究者的立足点、视线在悄然下移，更贴近民间根基。对于这种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最近文艺学界正在作系统的理论探讨和阐发，有人提出了一个名称，叫“文化诗学”。而在当今关于文化诗学的讨论中，人们谈论甚多、备受关注的是巴赫金的理论及其研究思路。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恰恰就是从民众生活、民众意识、民间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而这种视角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在《拉伯雷与果戈理》（1940）一文中，巴赫金指出：“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官方文化的框架内。其实，拉伯雷的作品只有放到民间文化的巨流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他认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深厚根源在于民间文化的强大潮流，民间文化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世界感觉和审美感受，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它以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艺术形式和语言形式，向官方文化、上层文化提出挑战，发起冲击，有力地动摇了单一文化的垄断地位。其结果是使

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对立逐渐模糊，同时使它们在相互碰撞中又相互渗透（参阅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虽然未必完全适合我们当今的文化和文学现实，但是，他提出要重视从民间生活和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这与我们前面所说把文学作为风俗史来看，基本观念和思路是一致的。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思路，对于我们考察研究我国九十年代的文学，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走上前台执政，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到中共十五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方向，带来了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精神生活的更为全面深刻的变革，其变革的总趋向是充分开放和多元化的。在这一总体格局背景下来看近十年的文学，更是走向多元化，走向多向度全方位的探索发展。要对近十年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景观作出清晰描绘也许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对其中某些具有时代特征和全方位意义的现象作点分析探讨。

比如说，九十年代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学的“边缘化”问题。何谓“边缘化”？虽然没有谁

对其作出一个明确的界说，但其涵义，人们是不难意会的：无非是指文学逐渐为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抛弃，逐渐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落到比较边缘的地位，逐渐从政治化、官方化的文学转变为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学等等。当然，文学界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往往不无失落感，不无自我调侃的意味，与过去那种作为政治、阶级代言人的角色相比，如今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显然是下降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学的“边缘化”也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而自由的发展空间，使得文学家复归为平常人，能够以平常心来体味民间生活，以平民心态来进行写作，从而使文学成为民间的、民众的文学，真正传达出来自民间的、平民的真实生活体验和心态，这样文学才真正具有了“风俗史”的意义。

与上述文学边缘化状况不无关系，我觉得九十年代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写作的“形而下”走向，形成文学的“泛化”，即平民化、平面化、平淡化，就是说文学已不再那么纯粹化，不再以文学本身为目的，尤其是不再执着于文学的艺术性目的或曰审美目的，而是泛化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有的甚至成为一种消闲式的当下即时消费文化，适应大众关注现实问题的心理，满足读者多方面多层次广泛的阅读需求。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大概也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有关。九十年代，西方后现代文化对我国文化和

文学的巨大影响已是不争之实，有人认为我国九十年代文化就是后现代文化，这恐怕不太确切。就九十年代的文学而言，应当说其主要特点还是多元化，是杂泛，比如现实主义的冷峻与忧患，现代主义的迷惘与焦虑，后现代主义的游戏与调侃，杂然并存，既相互对立冲突，又相互交织渗透。不过从发展趋向看，是越来越走向“泛化”，越来越走出纯文学的“象牙之塔”，越来越走向与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的融合。这是时代变革使然，至于该如何认识评价，则是另一回事。

此外，与上述状况相关联的，是文学价值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文学是以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一元化的价值观逐渐被打破或者说解构了；与此同时，文学界又试图追求建构一种纯文学的价值观，一种满足文学主体自我表现或自我实现要求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流行一段时间后也逐渐被打破和自我解构了。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文学随着逐渐边缘化和杂泛化，文学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其变化的趋向是愈来愈走向对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价值观的融汇和认同，当然，其中也还包含文学家自身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思考与追寻在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显然都不是那样单一，而是充分多样化和多元化了。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中期文学主体性问题讨论以来，文

学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强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九十年代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所带来，是这种时代生活中的价值多元化在文学中的投射，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身的深刻变化。

总而言之，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九十年代的文学，愈来愈从政治的樊笼中走出来了，也愈来愈从文学自身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了，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反映出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价值追求，或至少与民众的生活状况和追求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沟通。我们也许暂时还不必急于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作出判断，比如说是积极的因素多还是消极的因素多等等，目前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还是这些事实本身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东西。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葛利叶曾经说：“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页。）当然我们这里不单是谈小说，而是把九十年代文学作为一种整体形态来看待，那么这种文学形态就更能说明一种秩序、一种这个时代人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把握世界的方式。这样我们也许就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把九十年代的文学（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主要形态）作为这一时期民众生活的历史，即巴尔扎克所

说的“风俗史”来看待，用巴赫金那种“文化诗学”的眼光来观照和研究，这既切合此一时期文学的特点，同时这种新的视角又有可能使我们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说到民间生活形态，其实还可以再作点区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般有两个层面，即物质生活的层面和精神生活的层面，因此，如果把文学作为一部社会生活的历史，又尤其是一部民间生活的历史来看待，那么从物质生活的层面，即人们的生存活动或日常生活行为看，是一部“民俗史”；而从精神生活的层面，即人们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对生活的感觉、评价与期待追求等来看，则又是一部“心灵史”。当然，这两个层面一表一里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在巴尔扎克的时代，物质生活层面的喧嚣远胜于精神上的追寻，因而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也主要是关注社会事件、人物性格、恶习与德行等等构成的风俗图景，那么我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在物质生活层面极为活跃喧腾的同时，精神生活层面也是非常繁杂浮泛的，这一切都不能不以种种方式反映和投射在文学中。因之，九十年代的文学不只是一部风俗史，更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的心灵史，即精神生活的历史。当然，文学作品作为作家个性化的创作，首先具有个人心灵情感的特点，是其个人精神生活的写照；但从社会生活方面而言，应当说也是某种社会心理的投射，反映出特定时期人们精神生活上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九十

年代文学所反映折射出来的某些生活现象，尤其是精神生活现象是引人深思的，无论是从文学的窗口来看现实生活，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视野来看文学，都值得作一番认真的探究。

比如由最近的“法轮功”事件及其类似的现象，就颇可引起我们的一些寻思。作为“法轮功”组织核心人物隐秘的政治图谋和经济图谋姑且不论，仅从迷恋“法轮功”的一些平民百姓而言，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从表层来看，他们参加练功是为祛病健身、延年益寿，即解决肉体生存上的问题；然而稍微深入一点就可以发现，其中更主要的还是精神信仰、精神寄托的问题。一些人之所以有意无意地在其中寻求精神的寄托乃至归宿，显然其精神、灵魂在实际生活中出了问题。这还不只是在此类打着“气功”名号的活动中，而且在一些所谓特异功能、神医巫术、生命的神秘现象等等的社会传播中，也或多或少反映出这个问题。这类东西之在民间大有市场，正说明当今民众精神生活方面的某些特点。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中也有所反映，有的作家从当初的满腔热情严峻关注和描写社会现实，走向逃离现实生活、沉迷于探索所谓生命的神秘现象中去。如果把此类个案放到上述民众生活和民间文化背景中细加分析，则从中既可看出其个人心灵变化的轨迹，并寻绎其根源，同时也不难根据这种文学的折光投射，

对民间生活中这类精神生活现象作出阐释。

与之相类似的，民间生活中还有诸如吸毒的现象、自虐自杀的现象、性放纵和性虐待的现象、窥探他人隐私或自我抛售隐私的现象、追求当下享乐、生活游戏化、人生游戏化的现象等等，这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灵魂的沉沦与救赎、放逐与回归的问题，有一个精神向何处皈依的问题。九十年代的文学不少作品都写到这些现象，触及这类问题，有的文学现象本身甚至就是某种生活状况的范本，给人们以某种昭示。

当然，九十年代文学中也还有另外一类现象，一些作家仍然热情执着地关注现实变革，张扬社会理性，关怀人文情感，倡导文明进步，批判腐败堕落，寻找理想，追求崇高，热爱生活，拒绝虚无；对文学活动本身，也有反对粗鄙化、媚俗化等等努力，体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精神追求。从这样一类文学景观中，同样可以看出大众生活中某种精神生活状况和精神价值取向的折光与投射。

总之，根据中国九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如果我们能够超越以往惯常的那种社会学、政治学的或纯文学的观念，而以文化诗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从风俗史和心灵史（或曰精神生活的历史）的意义上来观照和研究它，或许有可能对一些文学现象作出更切实深入和更富有新意的阐释，从而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

正是基于以上的基本看法，我们策划编辑了这样一套“九十年代文学批判”丛书。本丛书拟选取九十年代文学大观园中若干比较有代表性、也比较引人注目的景观加以观照评析。我们设想，每本书选择一位或几位在当今文坛有一定创作实力和影响，并代表了某种文学观念和精神价值取向的作家加以论析，一方面在认真研读作品和作家创作自述以及评论界对该作家创作的评论的基础上，对此一“个案”作深透解析；另一方面则广泛联系社会生活、民间文化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状况进行多层次多向度的阐发，努力使文学与生活、作品文本与作家生态（尤其是精神生活状态）互阐互释。就丛书的每一种而言，只评析某一“个案”，即一两位或几位作家所代表的文学现象和与之相关联的大众精神生活现象；而合成一套丛书来看，则构成对九十年代文学的全方位扫描，庶几能看出近十年文学多元化、无主题变奏的大致轮廓；同时，通过这一文学万花筒，也可大致看出近十年中国社会变革和大众生态的方方面面，从而触摸到时代变革发展的某些律动。

本丛书的撰写只有大体一致的原则要求，而并无严格的规范。文学创作是个性化很强的精神创造活动，文学批评也同样如此。由于每一种书所选择评论的作家及文学现象各有特点，而且著者对于评论对象也往往有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和理论阐说，因而彼此间会显得形态

总 序 ◀

不一、风格不同，我想读者诸君尽可从中领略不同的风景，从不同的方面获得启发感悟。当然，由于编著者的学识和水平有限，著作中可能仍有不尽完善或不妥之处，请各位作家、评论家及读者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赖大仁

1999 年 10 月